

* 學術會議 *

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學術研討會紀要

林宗毅*

本所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假本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會中共發表論文十二篇，針對四十年來中國文哲之研究成果進行檢討，並對未來有所展望。

論文主講人年齡皆在四十上下，可以說是代表了臺灣中生代學者對其研究範疇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及研究成果。而邀請與會的學者也都學有專攻、並具討論熱誠，大家共聚一堂來看各篇論文是否需再作補充或修正。希望經過充分討論、修正後，與民國八十年舉辦的「中國文哲研究的展望」小型國際研討會所提交的論文一起出版，供學界參考。

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一場

〈戰後臺灣關於儒家思想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黃俊傑先生（臺灣大學歷史系）

本文以為戰後臺灣儒學研究的共同特徵是：(一)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二)對中國大

* 林宗毅先生，本所臨時助理。

陸變局的關懷。而從研究方法論的立場，戰後臺灣基本上有三個儒學思想流派：(一)歷史學的儒學研究，可以錢穆、徐復觀為代表；(二)哲學的儒學研究，可以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等為代表，此派主要採唐先生所謂「即哲學史以論哲學」的研究方法；(三)社會科學的儒學研究，此派主要在證明東亞社會之所以能成功地發展經濟，乃因於本有之儒家精神而來者，此以黃光國、余英時為代表。最後，作者指出未來儒學研究的展望有二：(一)中國詮釋學的開發；(二)中國思維方式的研究，即指身體思維而言。

講 評

勞思光先生（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

1.「方法」與「觀點」並不同，前者是一種程序，經由此一程序而達到某一結果，依此，徐復觀、錢穆所用之所謂歷史學方法，強調歷史發展觀點，只不過是一種觀點，並不特別。

2.事實上，詮釋學也是一種「移植」；而「身體思維」一詞意義未明確界定，古人以身體為比喻，皆不足以表明是某一種特殊思維，而欲發展身體思維得提出理據。

韋政通先生（中國思想史專家）

1.題目部分，「臺灣」二字宜改為「臺港」。

2.背景部分，本文引了許多臺灣教育發展的狀況，其實與新儒學無多大干涉，應從兩方面來看：(一)與五四反傳統的潮流有關；(二)與近代西方思潮的衝擊有關。

3.本文提到的兩個「特徵」似乎都不必再多說，自然就是如此。如果要談，應從與先秦及宋明的比較來談。

4.徐復觀、錢穆兩人的問題意識完全不同，分類上宜再作斟酌。

5.臺灣儒學的主流有二：(一)儒家傳統與現代化；(二)官方的儒學，即儒學的政治化。

6.儒學未來要回應的問題有五：(一)民主的問題；(二)在多元而開放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三)倫理重建如何提供資助；(四)如何面對「自由化」；(五)社會主義的問題。

7. 如今儒家的基本精神——「實踐」，已淪落，無法表現生命見證。
8. 有無可能出現「臺灣的儒學」這一問題，仍值得去研究。

答 辯

1. 我對現代年輕學者無視於中國古代優良之注疏傳統而去竊取西方東西的現象不滿。其實，中國的「詮釋學」有一個特色，即歷史性與超越性之間的緊張和循環關係，這在孟子學的傳統應已有某種表現。
2. 「方法」二字，到底是方法、立場或觀點，確實還可以再討論。
3. 背景部分，我的文章太偏於外部，內部需再作補充，這點我完全同意。
4. 徐、錢二人問題意識雖然不同，但異中有同，如二人都習於在發展中掌握現象及強調將問題擺在脈絡中討論。
5. 基本上我認為「官方儒學」並未在臺灣歷史上留下腳印，雖然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是必讀教科書，其效果也只是使反中國文化的年齡層提早到中學而已。
6. 未來發展的看法，我與劉述先先生近幾年文章中所談的較接近。
7. 「臺灣的儒學」之來臨是可期的。

〈日本漢學研究〉

戴瑞坤先生（逢甲大學中文所）

本文將日本明治維新至今為止的漢學研究分為五期：(一)衰弱期：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年（西元1868~1887年）；(二)復活期：明治二十一年至明治四十年（西元1888~1907年）；(三)開始科學化期：明治四十一年至大正七年（西元1908~1918年）；(四)「支那學」化期：大正八年至昭和二十年（西元1919~1945年）；(五)分工合作期：昭和二十一年至昭和六十三年（西元1946~1988年）。並分述現況如下：(一)研究漢學人數驟增；(二)漢學研究者的大團結；(三)加強國際漢學的聯繫。文中並介紹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宮內廳書陵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斯文會、東方學會、日本中國學會等學術機構。最後，作者並肯定地說：無論從文化背景、漢學資料、研究人才、研究成果各方面，臺灣都可在主觀的條件下確立其國際漢學中心的地位。而日本漢學研究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講 評

黃錦鉉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1. 本論文採取斷代研究，截取日本明治時代的漢學研究為說明要點，既然如此，建議題目似可改為〈日本明治時代的漢學研究〉；又作者所提若干檢討意見，似亦可斟酌另立題文，以符內容。

2. 明治時代乃日本國力強盛之始，漢學對其實質之影響，似可補充說明。又當此時，其國勢日強，一方面吸收西洋科技知識，同時也吸收中國文化，並能加以昇華轉化運用，這點似應注意及之。

鄭樑生先生（淡江大學歷史系）

1. 題目似以改為〈日本的漢學研究〉較妥。

2. 從平常較習慣的用語看，如漢人、漢字、漢藥之例，以漢學統指日本對我國學術文化的研究，並無不可。

3. 王仁，據東京上野公園的王仁碑所紀，王仁自稱其先為王鸞，鸞之後為王狗。狗，原為漢高祖之後裔，至百濟始易姓，此乃多數日人所認為韓人的古代東遷者，事實上均為華人苗裔。

4. 《論語》在三世紀末已成書，其東傳固無問題，然現行《千字文》之是否與《論語》同時東傳，不無商榷之餘地。現行《千字文》乃梁（502~557）周興嗣所撰，成書於六世紀。

5. 遣唐使，自七世紀至九世紀（即630~894）之間前後共任命十八次，實際來華僅十五次。

6. 當時漢學式微的原因主要是家學化的結果。

7. 日本中世的漢學研究係以禪僧，尤其以五山禪僧為中心。

8. 《五山文學全集》五冊乃上村觀堂（光）所編輯，所收錄之禪僧作品並無百餘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的玉村竹二曾另蒐羅未收錄及未刊行之五山禪僧作品輯為七鉅冊。

9. 德川幕府只以朱子學作其文教政策之根本，以為學官。至於古義學派、古文辭學派、陽明學派等則曾被目為異學而加以查禁。雖然如此，日本所取以為文教政策之中心思想者，係朱熹所論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性理方面則未加重視。

第二場

〈石學的展望〉

葉國良先生（臺灣大學中文系）

葉教授認為石學過去已有穩定的基礎，未來當有樂觀的發展，因為(一)近代不斷有新資料出土或發現，增加了研究的內涵；(二)宋以來，石學書籍不少，但多為目錄或研究之作，而少錄本文，或不摹寫，或摹寫失真，若想從事研究，仍需另尋拓本。而今複製技術進步，公私收藏易於結集出版，資料取得大獲改進；(三)可一次取得大量資料，做較整體之研究。

作者又以為：今後石學的研究，將建立在昔日的基礎上，並由考證、括例之學轉化為資料的整理及資料的運用兩個範疇。前者應包括(一)斷代或分類出版拓本；(二)文字考釋；(三)釋例三大項；後者係指對其他學術領域的價值，其範疇視它所能提供之可能性及學者個人素養而定。作者認為尚可繼續發展或開發的領域有六：(一)結銜研究；(二)古都學；(三)種族姓氏研究；(四)人名學；(五)文學；(六)書法史。

講評及討論

毛漢光先生（史語所）

1.將拓片加以集釋附考又攝製成冊，除方便於專家研究碑誌以外，又可方便於研究政治、社會、史學、文學、文字學等學者從碑誌中提取資料。而且集釋附考以後，即可輸入電腦。

2.輸入電腦後，即具自由檢索功能，不必再製作固定索引。

3.如果石刻文字已輸入電腦，即可透過自由索引提出作串聯工作，不必再印固定的索引書。

4.石刻資料除作者所指出之六項發展方向外，尚有若干方向可供發展，如文字學。

5.可將石刻資料與其他資料結合，必可加速石學之研究。

周鳳五先生（中正大學中文所）

文中論及資料之整理，分爲(一)斷代和分類出版拓本；(二)文字考釋；(三)釋例。其屬資料整理者僅第一項而已，其餘兩項皆研究工作，而第一項應分爲二子目，即(一)拓本之複製；(二)僅抄成文章者。如更欲推而廣之，則編字表、辭典。至於資料的運用，稍顯瑣碎而不周全，不妨大別之爲：(一)語言文字學：文字、聲韻、語法、辭彙等；(二)文學：文章體製等；(三)歷史學：古都學、種族姓氏學等；(四)藝術學：書法美學、書法史等；(五)其他：如校勘、輯佚等。

丁原基先生（東吳大學中文系）

1. 葉先生文章的第一頁提到傳統石學可以分爲兩個系統，即考證之學及括例之學。我個人以爲應該還有一個目錄學，如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中也著錄一些石學資料，但《四庫全書》卻仍把它們放在目錄類。

2. 石學分類，葉先生對現代的分類有何看法？

3. 如何建立蒐集石學資料的途徑及方法，如國外的石刻、方志及地理書中的石學資料等，如何有系統地蒐集？

答 辯

1. 拓本的出版、考釋最好同時做，個人很贊成，只是目前考釋的工作正在進行，而拓本的出版並不理想，故有此建議，並非沒有說到的就不去做。

2. 本文之「展望」實不必太遠，已夠學者研究多年。以後若仍有發展，再如周先生所提分得細一些，事實上很多範疇根本沒人做，先分也沒多大意義。

3. 我說傳統石學可分成兩個系統，並非說「只能做這樣的兩個分類」。至於四庫館臣的分法自有他們的體例及立場，那樣分也沒有錯。

4. 分類本來就可以分得粗或細。

5. 我還是建議有拓本的就趕緊出版。

〈錢賓四先生理學研究的檢討〉

鍾彩鈞先生（文哲所）

本文以爲：錢先生治學的基本動機在發揚民族文化，以促進民族之再生。他視

儒家思想為民族文化的中心力量，而理學則是我國後期的儒家思想，故成為重要的研究焦點。錢先生採學術史的方法，即融貫古今，每探討一個概念，必將之置於思想史的脈絡去看，而且有和會歸一的傾向。錢先生對陽明的貢獻，一是打通內心修養與認識外物的工夫，而一歸於實踐；二是重視心與事的關係。但他也指出陽明思想的歧點，主要是以良知為「吾心本體」與「天地萬物本體」的矛盾。錢先生對朱子的評述，特色是強調朱子以學為主，又以自然、人文的關係來解釋理、氣、心、性等概念。《朱子新學案》則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

講 評

陳郁夫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1. 作者引文太多，最好能融化於行文之中。
2. 論清末民初中國文化論戰一段不甚切題，似宜刪之。
3. 敘述錢先生對陽明、朱子思想研究部分，次序應調整，內容應加強。

戴景賢先生（中山大學中文所）

錢先生的學術史觀點形成於民國二十年代，其如何形成，內容如何，應再加研究。

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三場

〈大陸學者對孔子的評價〉

傅武光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本文旨在綜述近年來大陸學者對孔子評價之觀點，及其理論依據。作者以為大陸學者對孔子之評價：(一)大多秉承政治教條而言之；(二)以馬克思「存在決定意識」之唯物論為研究孔子之指導思想；(三)舉證斷章取義，甚至曲解原典；(四)缺乏對孔子實際生命之體驗；(五)但總體而言，孔子思想被肯定之積極因素，多於消極因素；(六)只是前者集中在倫理、教育、知識思想；後者則在孔子之政治思想；(七)已有學者勇

於突破政治束縛而獨立思考，見解較近於孔子思想本真。

講 評

杜正勝先生（史語所）

1. 題目宜改爲〈近十年來大陸學者對孔子的評價〉，因爲引用資料以1978年以後爲主。

2. 「古爲今用」四字除了刺耳些，是不是有另一層值得深思的地方，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用今天的觀點來發揚孔子的思想。

3. 結論第七點提到少數學者勇於突破傳統作獨立思考，文中似未有明確發揮。

熊自健先生（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本文前後引文不統一，前面清楚提出某某人意見，後面則以「有人認爲」來概括。而論文中只重大陸學者一般之通行研究法，而忽略個人創造性，例如李澤厚所提出的仁學結構分析，作者並沒有特別留意。此外，作者對於大陸學界研究和評價孔子的焦點，以及其爭議性的課題亦忽略，使人不易掌握重點。又作者有其個人立場，可惜未對其立場加以理論說明。

答 辯

每個時代確實都是在「古爲今用」，只是我並不滿它在馬列主義的前提下被「古爲今用」。其實孔子的思想不在如何爲各時代所用，而在點醒、指出了人的普遍性，亦即人之所以爲人的尊嚴。

〈近四十年臺港地區唐代小說研究之回顧〉

王國良先生（東吳大學中文系）

本文採用分類條舉的方式對近四十年（民國三十九～七十八年）臺港地區的唐代小說研究進行回顧與評述，「介紹的重點在選而不在評，而去取的微意存乎其中。」選錄之論著，大別爲：概說（通論）、考證、賞析、專題研究、比較研究、綜合研討六類。

講 評

鄭明娟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1. 內容與題目不太符合，何況學術目錄不能作為正文，只能當作附錄。而就論文的彙編而言，其選擇的標準應該明白交代。

2. 單篇論文最好也能指出後來成書之出處；本文所注明之出處有一手的、也有二手的，似乎不太統一。

3. 按語顯得粗略；統計也不夠精確。

4. 回顧應作價值上的判斷。

5. 分類重疊、不清。且各篇分量不同，不能等而比之。

6. (1) 正文本身應作現象面的分析。

(2) 論文的統計也應作分析。

(3) 並應作：

⊖ 指出其特殊貢獻。

⊖ 與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研究作比較。

⊖ 檢驗研究者的文學觀如何？提出其方法論。

王三慶先生（文化大學中文系）

1. 寫作目的何在？統計之外，應該予以指出。

2. 好的篇章應特別提出解題。

3. 唐代小說界定的問題，其範圍如何？是否包括敦煌變文？

4. 分類標準應交代。

答 辯

1. 由於時間不夠寬裕，故多所疏忽。

2. 關於單篇文章後來成書者，因本文作的是「回顧」，故似無必要列出。

3. 「唐代小說」之定義，這裏基本上所列的是文言小說，不過，可以再考慮敦煌變文是否列入。

〈帛書《五行篇》、《德聖篇》論道德、心性與形體的關聯〉

楊儒賓先生（清華大學中語系）

1973年，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了一大批帛書，其中的《五行篇》與《德聖篇》對近代學術史影響尤為深遠。這兩篇文章的思想基本上是從孟子來的，總體的傾向是將孟子的思想帶往更深層的意識，直至身一心一性一天交會處。而思、孟後學之「案往舊造說」可分為二期：第一期是將金、木、水、火、土五行改變成仁、義、禮、智、聖；第二期更將這倫理化的仁、義、禮、智、聖往內收斂，附以五行之名。其發展方向大體上是將孟子的道德哲學更深入地奠基在人的身心結構連續體上。就現象而言，乃緣著兩條路線進行：一是順著「心」的路途走；一是順著「氣」而行。

至於，荀子對此學說所加的贊語：「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意指為何？作者認為黃俊傑先生以「心」、「道」的角度對照思、孟與荀子觀點的差異所作的解釋較龐樸的「套套邏輯」說法合理。作者進一步申論，以為孟子言四端，其四端猶帶有意向性，仍需向外在的對象擴充；思、孟後學言四行、五行，重點卻是把儒家基本的德目意識化，精神化，主體化，此傾向與荀子重統類的基本格局恰好相反。再者，以仁、義、禮、智、聖等氣界定不同的道德心靈之始源階段，且可以之轉化人的生理機構，使心、氣、形成為同質性的結構，這樣的道德實踐對荀子而言，當然完全超出其認知架構之外。

講 評

林麗真先生（臺灣大學中文系）

1. 頁三七～三九，論及大體對小體的滲透、寢入與轉化，似乎可再詳言「心」「思」「志」「氣」之間的細密關係。如論「志」與「氣」的關係，則不可忽略「志壹則動氣」的「壹」的問題，蓋帛書《五行篇》之〈經7〉〈說7〉，言及「捨其體而獨其心」時，即甚重視「能為一」、「以多為一」、「能以王為一」。又如論及「思」，作者謂指「心靈一種自覺的、常惺惺的功能」，此言不差，但應可再對勿忘勿長、敬虔警醒、心靈專注、持一不散之工夫再作說明，以便將之與

「心之行」、「志之壹」等有所聯繫。

2. 頁二五～二七，詮釋「心之容」，採郭氏意見，謂指「心靈顯出的各種狀態」。然按《老子·二十一章》「孔德之容」，高亨注曰：「容，疑借爲掇，動也。」《說文》：「掇，動掇也。」《莊子·天下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則「心之容」顯指心之行、心之動。故若解「容」爲「掇動」義，似乎更具活潑生動義，較能彰顯心靈活動時刻處在流行運作中的擴展性，也更能支持本文所強調的大體對小體的滲透、寢入與轉化。

3. 頁六〇倒數第四行，「身體」二字，似改作「心靈」二字爲切。

4. 本文提及近人所見甚多，惜未加注。若能補注文後，則更盡善盡美。

蔣年豐先生（東海大學哲學系）

楊先生這篇文章最成功的是在李學勤的基礎上繼續深入探討，並以形體哲學的觀點來闡述，做得非常好。不過，仍有如下幾點值得商議：

1. 論證完全集中在「案往舊造說」上，而「甚僻違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卻著墨甚少，不到兩百字，這樣的論證還不夠充分。

2. 《荀子》書中其實常提到仁、義、禮、智、聖，禮、義當然不用多說，像仁、智、聖，或仁、智或智、聖並提也所在多有。

3. 在〈樂論〉篇中他也提到「五行」一詞，是他自己所謂的「五行」，不是批評別人的。

4. 荀子哲學中「類」與「名」的觀念很強，他批評思、孟之徒「甚僻違而無類」，龐樸把「類」視爲一般意義，然荀子也許是把它當成一個專有名詞。

5. 荀子很重視「明」的思想，而《五行篇》引《詩》很少，有一條「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它卻引了，本文中 also 提到達最高境界時人會透明化，有「明」的意思，從這兒看，是否「明」也可以納入考慮。

6. 文中引用到黃俊傑先生的文章，就孟子、荀子二者的心來考慮，基本上孟子之「心」偏於「內聖」、荀子之心偏於「外王」，但這還不夠，應該以「身」爲著眼點，因爲這篇文章是講身體哲學。

7. 在材料上，我覺得本文的論證要成立，必須李學勤先生的論證要成立，而他的論證要成立，得先肯定《尚書·洪範》是西周的作品，但有人認爲《洪範》是戰國時作品，如果是的話，那李學勤和本文的論證就不能成立。

第四場

〈比較四位哲學史家對孔子思想的研究〉

傅佩榮先生（臺灣大學哲學系）

本文從體系、發展、經典、經驗四點分別比較了胡適、馮友蘭、徐復觀與勞思光四位先生對孔子思想的研究及其評價。作者指出四位先生對孔子有不同的理解，其中胡適認為孔子思想並無多大特色與價值，只不過是一些常識哲學較合理而已。馮友蘭則比較客觀些，較能認真考慮適當的經典，但缺乏體系性。而徐復觀則指出孔子思想體系，但由於刻意迴避「天」之概念，以致只能照顧某些經典，由各種發展角度來看，其理解過於突兀，不像孔子承先啓後的溫和作風。至於勞思光先生的理解，則兼顧了經典、體系、發展、經驗各方面，但卻加入許多個人的哲學成見，故而對孔子的天與人性曲解之處不少。

講評及討論

高宣揚先生（東吳大學社會系客座）

應允許哲學家運用不同觀點去研究哲學史，因為哲學史家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哲學觀點，而在從事哲學史研究時，也免不了以自己的哲學觀點去評述哲學史。

梅廣先生（清華大學中語系）

徐先生之所以較抵抑宗教，乃是其時代思潮的影響。而且徐先生所要強調的是人文精神，他以為道德、不朽等皆有其超越性，但不一定在宗教上表現。

饒宗頤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傅先生文章關於馮友蘭部分，似乎只取早期，也就是第一本的哲學史，事實上他後來花了很大工夫修改，且在孔子前面加了一章來談周公。如果只以第一本作為批評的對象，難免有些不足。

答 辯

1.馮友蘭在1949年以後又對自己的著作進行了多次的修改，可是越改越辛苦，後來我覺得也就算了，乾脆用他早期、臺灣最流行的本子來批評。

2.至於侯外廬等人編的思想史，講到孔子，在知識論部分談得很深入，但「天」與「人格」部分就有些勉強，何況臺灣不易見到他們的書，如果拿出來討論，意義恐怕不大。所以選擇討論對象一定有他的限制和標準。

3.我要強調中國古代絕對沒有像西方所說的「人格天」的觀念，千萬不要弄混了。

4.徐先生說春秋時代是一個禮的世紀、人文的世紀，這句話孟子是不會同意的，孟子認為春秋是禮壞樂崩的世紀。

5.我的意思不是說沒有人可以寫哲學史，而是必須意識到方法、原典的重要性等等各方面。

〈詞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林玫儀先生（文哲所）

本文就過去詞學之研究概況，略加整理，分類如下：

1.詞學專著之分析：(一)總集之編纂整理或校訂；(二)名作之選注或賞析；(三)個別詞家之研究；(四)論述性專著；(五)詞論之整理或闡釋；(六)詞學工具書類；(七)其他（詞樂、詞之專刊、讀詞日記方面）。

2.學位論文之分析：(一)詞家及詞作之研究；(二)詞論及詞話之研究；(三)韻律之研究；(四)其他方面。

3.學術會議之分析。

並以爲底下數端仍有所不足：

1.資料方面：(一)編輯總集及近人詞錄；(二)蒐集詞論；(三)編印詞學目錄及論文集。

2.研究方面：(一)詞家；(二)詞作；(三)詞史；(四)詞之韻律問題；(五)利用敦煌資料以從事詞樂及詞調之研究。

講評及討論

張以仁先生（史語所）

1. 整體性、有機性需再加強。
2. 眼前論文似屬表面材料而已，層面非常廣泛，但需再深入些。
3. 題目太大。
4. 取材標準未交代清楚。
5. 若干題目名稱可以略加修改。
6. 展望方面，需加強研究之深度。
7. 有語病。

王熙元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1. 「學術會議」宜加「論文」二字。
2. 缺少批判及整體歸納。
3. 取材上，時空要確定。
4. 近十一年來的資料未收，大陸方面的也不全。
5. 局部資料需補充。

饒宗頤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1. 大陸鑑賞辭典不應算作學術著作。
2. 選本太濫。
3. 標舉詞家，只舉二家並不妥。

黃志民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

1. 建議全文改分為：
 - (1) 回顧部分：將過去詞學研究成果，條析其現象，評論其得失。
 - (2) 展望部分：提出未來詞學研究應有之重點與方向。
 - (3) 目錄部分：將過去詞學專書、論文，在時間方面以十年為期，空間方面以臺、港、大陸及其他地區，再依原分類條列之，如能對之做一提要、評

介，則更佳。

2. 應加強蒐集學報、期刊上的論文。
3. 展望部分的研究方面，宜有詞論一項。
4. 文中所謂「展望」，若與「回顧」對照，在研究方向與方法上，似無突破或超越。
5. 某些數據可能有問題，如：
 - (1) 頁二，行三十：《唐宋詞新賞》，應為十五冊，始於李白，作者共一百二十餘位；同頁，行四十六《宋詞鑑賞辭典》詞人二〇二家，詞作七二一篇。
 - (2) 《唐宋詞新賞》似來自大陸，若是，則不宜列入。

〈新法看舊詩——臺灣七十年代新型說詩方式的檢討〉

呂正惠先生（清華大學中語系）

本文分四方面檢討臺灣七十年代新型說詩的方式：(一)分析葉維廉、高友工、梅祖麟在其研究中國古典詩的論文中所呈現出來的理論架構；(二)以顏元叔為核心，檢討七十年代純以新批評的方式解讀古典詩時所呈現出來的問題；(三)以葉嘉瑩及其深受新批評影響的學生為重點，考查中文系學者對於比較研究所作的一些回應；(四)略微展望將來以新方法研究古典詩的可能途徑，亦即只要有人敢於嘗試以一種新理論闡釋中國的古典詩，則「新法看舊詩」的新局面就會再度出現。

講評及討論

柯慶明先生（臺灣大學中文系）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呂先生對現象背後的解釋，可能照顧得並不周到。

「新批評」在臺灣開始受到重視，應該從陳世驥來臺大演講說起，更重要的是夏濟安的提倡，他編《文學雜誌》時，已經請了很多中文系的先生，以一種不以考證為主，而以作品內容或技巧為主的方式來討論作品，葉嘉瑩早期大部分的文章就發表在上頭，但這並非她自己發展出來的，而是受到她老師顧隨的影響；她進入臺大後，又受到鄭騫的影響。基本上他們是傾向於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境界說。至於葉嘉瑩受新批評的影響應該是在哈佛的時候才對。

再者，葉維廉等人所提出來的文學理論似乎跟他們所用的批評方法有一段「距離」。

另外，我認為葉維廉基本上是很受道家美學影響的。而他所建立起的一套理論，其實並不是用來解釋中國的古典詩，而是用來改革或擴充當時狹隘的現代主義之下的現代詩，所以與其說是解釋性的理論，不如說是作為一個詩人在創作上的主張，這是我所要替他辯護的。

龔鵬程先生（淡江大學中文系）

呂先生這篇文章可能存在著觀察及理解兩方面的缺乏。觀察，囿於師友聞見，頗失片面；理解，亦囿於師友見聞，失之輕率。例如：文中所談只是臺大中文系當年的一些現象，顏元叔、葉維廉只是做為與中文系對照或敵論而存在的，除了略略提到黃永武外，沒有談到任何一位非臺大中文系的新型說詩者。這種論述，對臺大以外的中文學界，頗不適用。

黃景進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

1.優點：

- (1)從複雜的歷史中理出清楚的輪廓。
- (2)評論七十年代文學批評家的優缺點，時能擊中要害。
- (3)「對事不對人」的評論態度，足為典範。

2.可補充處：

- (1)顧此失彼，忽略了其他的批評方法，如「神話基型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現象學批評」。建議補充一份書目，以顯示當時詩評的全貌。
- (2)本文以有沒有「理論」作為判斷詩評的標準，但「理論」意義似欠清楚。
- (3)論某家詩評的優缺點過於籠統，不夠具體，尤其有些關鍵處反而省略。
- (4)本文極力批評「新批評」的缺點，對其優點或貢獻則頗為忽略，似可補充。

答 辯

1.我覺得柯先生在解釋過去時，可能跟我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我可以從認識龔先生他們談起，坦白講，當年師大幾位年輕學者如龔鵬程、顏崑陽及他們亦師亦友

的張夢機等，他們對古典詩的了解甚至比我們這羣人好一點，我文章就特別強調這一點，指出我們當年的缺點。柯先生在重述這個傳統時，好像覺得沒有那麼嚴重，他將此牽扯到神韻及境界說的傳統。以我個人觀點而言，當年在葉先生的影響之下，大家那麼重視此二傳統，正足以說明當年學長們並不重視歷史因素，也說明了葉先生及新批評的影響比鄭先生的影響大些，這是我同柯先生之間的差距。

2.我想龔先生可能有些誤會，例如龔先生所提的像偉文、故鄉、長橋在做詩歌賞析時，已是七十年代中晚期的事，而新批評的主要論戰已經結束。後來臺灣詩歌賞析的風氣，事實上已經是在新批評的影響之下形成。而中文系之所以注重賞析，乃是在外文系的影響之下吸收新批評的長處，說是「同時」，可能是有點忽略事實。再者，基本上我認為龔鵬程、顏崑陽、張夢機三位先生，他們是傳統的說詩者，並非是新型的說詩者，所以我沒有提到他們。他們之中最有新風氣的是黃永武，我個人對黃先生最大的感覺，正如我論文所提，是有很多講得很巧的地方，可是不像前面幾位先生對中國傳統詩歌掌握得那麼好，至少就著作而言是如此。因此，在我看來他並不代表那一羣人，反而是那羣人中最特別的。簡單說，我沒有提到他們，因為他們並非新型說詩主要的潮流。也許，將來我在註解中加上一條，就會清楚一點。

第五場

〈當前《道藏》研究的成果及其展望〉

李豐楙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

本文以檢討《道藏》、道書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為主，至於與之有關的道教史問題研究則不加詳述。

作者以為：從正續《道藏》、《道藏輯要》重印之後，對於道教學界引起相當程度的激勵作用，讓歷來道門宮觀的秘藏寶笈能公諸於世，不再如前代學者借閱於道觀之內，耗時費事。但自上海涵芬樓印行之後，仍有待於後來學者專家的進一步努力，與相關條件的配合，其可檢討處有：(一)《道藏》的再重印與普及；(二)敦煌道書的搜尋與整理；(三)藏外刊本道書的編目與整理；(四)民間抄本道書的訪求與整理。

對於未來的《道藏》研究，其正進行中並可為將來之展望者，也有一些值得注

意的發展：(一)嚴謹的科學的工具書的出版；(二)《道藏》目錄的重新檢討；《道藏》、道書的電腦化；(三)《道藏》研究的總整理；(四)《道藏》研究中心的設置。最後，並指出《道藏》在宗教學、養生學、文化學方面有極豐富的史料可供利用。

講 評

饒宗頤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1.關於編寫第一部道教史的是許地山，我們不應該埋沒他的功勞。他蒐集的材料未編成書，現在在他的學生李鏡池那兒。

2.小柳司氣太所用過的《道藏》現在是在新加坡。

3.大陸的胡道靜（即《夢溪筆談校正》作者）也在做《道藏》整理，主要是藏外工作，聽說要出版了。

4.法國研究狀況應做更詳細之報導。

丁 煌先生（成功大學歷史系）

1.〈真誥〉在《道藏》中有南宋人改竄的痕迹，很容易看出來，至今卻無專文討論；而《道藏》在明代的纂修考，也無詳文考辨，雖有陳國符教授寫過《道藏源流考》，然其中仍有許多語焉不詳的地方。

2.日本、法國對道教的研究為什麼如此悠久，是有它的歷史背景。日本是爲了了解中國社會的基盤，配合其中國大陸政策，才進行研究的。在戰爭中他們得到了不少的便利。如南滿鐵路調查所、陸軍部的中國調查所，有很多學者提供關於宗教、社會變遷的資料，道教的研究在這時期應該是最盛的，日本這方面的許多大家，都曾在此工作過。法國則因爲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有點阻礙，在知識分子間有儒家思想、在民間有道教傳統，所以在明末就已經開始這方面的研究，魏蓋神父是最早做道教索引的。

3.另外，清末民初的沈曾植應該提一下，他的《海日樓札叢》裏有不少精闢的見解；民國有汪繼培的《讀道藏札記》，大陸最近已出版，臺灣也有微捲了。

4.在工具書方面，你提到的道教三冊，第四冊叫《道教研究的深化》，這是對目前道教研究概況比較新的一本介紹書。

5.大陸所編的藏外道書目錄已經向外公開了，但很多條目都很有問題。

6.藏外有很多書和藏內的版本不一樣，而且藏外的可能還更好一些，這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

答 辯

1.我注意過許地山整理《道藏》的工作，只是不知此書存於何處，謝謝饒先生指點。

2.大陸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確實存有許多問題。

3.今天這篇文章著重的是在《道藏》本身，所以對道教的研究概況之檢討也就不多說了。

〈詩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林慶彰先生（文哲所）

本文將詩經研究史分爲先秦、兩漢、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國等七階段來加以觀察，各個階段之概述附有近四十年代表性之論著，並予以分析、檢討，認爲可檢討之處有三：(一)研究者多缺乏後續研究，學非所用；(二)研究方法陳舊，每每將研究對象孤立，缺乏「史」的觀念；(三)研究方向應加以調整，多注意六朝、隋唐、元明、民國等四階段的研究。最後，作者以爲今後研究的展望，應努力的課題有二：(一)解決歷史分期的困擾；(二)凝鍊新方法以補不足。

講 評

程元敏先生（臺灣大學中文系）

1.優點：網羅相關書目，按順序排列，並有撮要，能提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論。

2.意見：

(1)就內容而言，所列書目大半側重專家研究；也有幾本是專題研究，有點脫出題目範圍之外。故題目宜再斟酌。

(2)詩序研究這一門未特別提出，可再加強、增補。

(3)唐以前之《詩經》專著雖幾乎全部亡佚，尤其是南北朝，然可從歷代文士

文章中蒐集他們論《詩》的資料，再彙編起來。

- (4)《詩經》學的分期確實不能以時代來分，但《四庫全書》的分法也不無可議之處。
- (5)外國研究概況也應敘述，至少日本有關資料不能忽略。
- (6)「新方法」始終沒有說清楚，如果能具體些，必能嘉惠許多研究同好。

李威熊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

1.優點：

- (1)資料周全。
- (2)論點正確。
- (3)命中問題所在。

2.意見：

- (1)主題：時空的界定似應清楚。
- (2)研究基本素材的選擇標準之問題，亦即作者可能不是以經學史的角度來寫。
- (3)分期問題：如「六朝隋唐」是否可以改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是否可以獨立為一期，而「魏晉南北朝」則屬過渡。
- (4)論證之用詞宜斟酌，如頁四一：「民國初年以來，對《詩經》研究較有貢獻的，如：魯迅、郭沫若、胡適等人，……。」原因何在？
- (5)碩士畢業以後，未繼續研究此範疇之學術，以「教育的浪費」責之，似乎言之過重。
- (6)前瞻的格局仍然不夠。

答 辯

1.程教授提到有關選材的問題，當時個人較著重的確實是專家研究這方面；將來若有機會，我一定會把詩序的研究擺進去。

2.魏晉南北朝《詩經》研究的材料很少，程教授以為可以從各文集中蒐集，以看出當時研究的整個狀況，這確實是最理想的方法。徐復觀先生在他的《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中也曾提到。

3.我並非完全贊同《四庫全書》的分期，只是認為它分期的概念，即以經學的

演變做爲分期的思考基點，這是可取的。

4. 蒐集材料未涉及日本或其他國家這問題，我在導言部分已經說過，這是有關臺灣《詩經》的研究，若要擴充，須待我個人語文能力的充實。

5. 在提到新方法時，之所以未言及具體的方法，是因爲個人仍在摸索階段，希望大家一起來開闢這一條路。

6. 郭沫若在很早以前曾把《詩經》中的四十篇情詩翻譯成白話，叫《卷耳集》，可能具有引導的作用；胡適在一九一三年寫了一篇〈詩三百篇言字解〉，是用較新的方法分析《詩經》的一個個的單字，影響很大，這些文獻是大家較常忽略的。

7. 關於「史觀」問題，我個人也沒辦法提出一個較理想的史觀，希望是由大家一起來努力。